

元·高麗僧義璇生平事跡考*

許正弘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蒙元時期為中韓佛教交流的一大高峰。高麗僧人入元者甚眾，其中義璇既得奉命住持大都皇家佛寺的大天源延聖寺，又受旨返麗行香，可謂備受尊崇，在元麗佛教史上均佔有相當的重要性。由於義璇相關史料的零散，學界過去雖試圖輯考其人事跡，但不免有所偏重與過於疏略之嫌。本文對義璇的生平行事，包括家世、師承、重要事跡與交游法嗣等面向，廣稽元麗史料，尤其著重高麗方面文獻，進行較為全面的考述，並冀能對元朝皇家佛寺住持的任用與高麗天臺宗的發展，提出解釋和說明。

關鍵詞：元朝、義璇、大天源延聖寺、高麗僧、天臺宗

* 收稿日期：2010.05.10，通過審查日期：2010.07.07。

本文惠承蕭啟慶師指正與推薦，文稿初成，洪金富師惠讀一過，並批改英文摘要，謹此申致謝忱。另曾宣讀於「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九十八學年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2010.05.14），復蒙徐兆安先生評論，多有匡正，併誌謝悃。最後，感謝兩位審查人仔細的審查與提供的高見。

【目次】

- 一、引言
 - 二、阿師本是衣冠冑：家世背景
 - 三、脫略富貴輕分離：師承淵源
 - 四、西遊卻被玉皇眷：住錫大都
 - 五、有儒釋賓友之歡：交游法嗣
 - 六、結語
- 附錄：義璇生平簡表

一、引言

阿師本是衣冠胄，脫略富貴輕分離。
西遊却被玉皇眷，錦袍錯落雲霞披。

這是高麗著名文人李穀（字中父，號稼亭，1298-1351）所作古詩中的四句，詩題為〈順菴新置大藏，李克禮州判作詩以讚，次其韻〉。¹ 順菴為高麗僧人義璇法號，與李穀乃多年舊游。在這二十八字中，義璇的家世、出家以至於重要事跡，包覽無遺，扼要概括，既屬詩人巧思，也是故友手筆。義璇，無論在高麗與元朝的佛教史上，都堪稱重要人物，然無詳載行事的碑傳可考，乏承傳思想的文集足稽，殊為可惜。李稼亭對詩句所指，肯定瞭然於心，今人追蹤義璇生平，卻須上下求索。李氏撰寫詩篇之際，大概始料未及於此吧。

蒙元時期，統治者優容各種宗教信仰，佛教尤其備受尊崇。宗教的興衰，原多「繫於時君之好惡」，釋氏極為元室推尚，遂有「不可與古昔同語」之勢。² 此外，蒙元幅員廣大，境內種族繁多，兼以交通便利，各國各族佛僧入元求法交流，盛況空前。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藏族喇嘛之來華，往往迭任帝師，元室敬禮尊信，「無所不用其至」，帝師弟子得授司空、司徒、國公號而繫帶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³

韓國佛教與中原淵源深長，海東僧人至中國習法屢見不鮮。兩國的佛教交流尤以隋唐與蒙元二個時期為高峰。元時，高麗作為屬國，雖仍能保存社稷、百官，但卻為蒙元嚴格控制。元室以公主下嫁，設置征東行省與達魯花赤，派駐軍隊，高麗對元朝則負納貢、助軍等義務。種種控制與義務，逾於過往之宗藩，彼此關係十分緊密。⁴ 此時高麗僧眾入華者不計其數，或為皇室抄寫佛經，或被旨受邀住錫，頗為元廷所重視。義璇即是高麗入元諸僧中的一員，以得元帝寵眷，被命住持大都皇家寺院之一的大天源延聖寺。延聖寺為泰定帝

¹ 〔高麗〕李穀，《稼亭集》卷14，頁7下-8上。

² 〔明〕宋濂等，《元史》卷202，〈釋老傳〉，頁4517。

³ 同上注，頁4520-4521。帝師制度，研究已多，此不贅列。帝師以外的藏僧行事，請見陳得芝，〈元代內地藏僧事輯〉，頁233-251。

⁴ 蕭啟慶，〈元麗關係中的王室婚姻與強權政治〉，頁231-262。

（1323-1328）所修建，先後成為顯宗甘麻刺（1263-1302）與明宗（1329）帝后的原廟，⁵ 是元代中後期一座相當重要的皇家梵宇。⁶ 義璇受旨駐錫，尊崇可見一斑。

義璇相關史料十分零散，近人如張言夢與桂栖鵬均圖輯考，未盡完善。⁷ 韓國學者閔賢九對趙仁規（1237-1308，義璇生父）家族考論頗詳，值得參考。其文原擬分為三，義璇應在趙氏家族與佛教關係一節中有所討論，惜未見載。⁸ 要而言之，前揭三文雖對義璇其人略有述及，但均非以之為主要考察對象，且或偏重入元行事，未得全貌，或所考事跡過略，有失精確。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以前引李穀詩句為線索，廣稽史料，再行考述，並冀能對元朝皇家佛寺住持的任用與高麗天臺宗的發展，提出解釋和說明。尚請師友不吝指正。

二、阿師本是衣冠胄：家世背景

請從義璇生父趙仁規談起。趙仁規，字去塵，平壤府祥原郡（今北韓平壤祥原）人，為高麗忠烈王（1275-1308）名臣。父瑩為金吾衛別將，乃一正七品的低階軍官，⁹ 外祖李文幹曾任內園丞，則為從八品的下級官員，¹⁰ 家世確

⁵ 關於元代原廟制度與管理官署，詳參拙著《元代原廟制度初探——以太禧宗禋院為中心》與〈試論元代原廟的宗教體系與管理機關〉。

⁶ 此寺相關問題的考辨，筆者曾撰〈元大都大天源延聖寺考論〉一文論之，宣讀於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等主辦之「紀念元大都」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07.29-30）。該文對義璇住持大天源延聖寺之事稍有考述，今擬藉本文對其人作進一步的討論。

⁷ 張言夢，〈元代來華高麗僧人考述〉，頁 40；桂栖鵬，〈入元高麗僧人考略〉，頁 58。

⁸ 〔韓〕閔賢九，〈趙仁規와 그의 家門（上）〉，頁 17-28；同氏，〈趙仁規와 그의 家門（中）〉，頁 5-32。

⁹ 〔韓〕金龍善，《高麗墓誌銘集成》，頁 629，〔高麗〕方于宣，〈趙仁規墓誌銘〉。金吾衛別將品階見〔朝鮮〕鄭麟趾等，《高麗史》卷 77，〈百官志二·西班·金吾衛〉，頁 575 下。

¹⁰ 《稼亭集》卷 3，〈趙貞肅公祠堂記〉，頁 9 下。內園丞品階見《高麗史》卷 77，〈百官志二·內園署〉，頁 567 上。又，仁規外祖，〈趙仁規墓誌銘〉記為

非顯貴，《高麗史》致有仁規「起於微賤」之譏評。¹¹

仁規早年就學，略通文義，十五歲左右投身行伍，充太子府侍衛。高麗選子弟習蒙古語，仁規與選，閉戶晝夜苦學凡三年，遂得嫻熟。¹² 對於蒙語的精通，加以通曉華言、雅擅辭令，讓仁規成為麗元間折衝樽俎的通譯使者，係其「拔擢飛騰」而得「驟秉鈞軸」的重要政治資本。¹³ 元世祖（1260-1294）曾讚仁規「解國語如此」，¹⁴「非國人耶！何其敷對詳明，辭色舉止絕不類東人也。」¹⁵ 仁規前後奉使入元凡三十餘次，「親奏情狀，無不允俞」。¹⁶ 官臻一品，封平壤君，卒後贈謚貞肅。妻趙氏，司宰卿（從三品）致仕趙溫呂之女，¹⁷ 生有五男四女，一女曾為忠宣王妃，其餘「子婿皆列將相」，貴顯無比。¹⁸ 義璇為仁規五男中的第四子，出身家庭如此，無怪乎李穀稱其「本是衣冠冑」，而謂其出家為「脫略富貴」。

義璇名字頗見異寫，生卒年壽文獻無載，今僅能自其兄弟的相關資料約略考之。義璇，文獻或作義旋。璇、旋互通，亦可作琬，美玉之意。以璇為名，

李「有芬」。

- ¹¹ 《高麗史》卷 105，〈趙仁規傳〉，頁 257 上。
- ¹² 趙仁規習蒙語事，《高麗史》本傳與〈趙仁規墓誌銘〉均載，所記時間則見出入。《高麗史》以仁規學蒙古語為稍長略通文義之後，並因此故得補諸校，累遷將軍。〈趙仁規墓誌銘〉則記仁規「習大朝言語」，事在補將軍之後。就史源學而言，〈趙仁規墓誌銘〉撰於至大元年（1308），自較朝鮮時編纂的《高麗史》更為原始。〈趙仁規墓誌銘〉又載仁規「年至志學……以文字為浮薄」，乃捨而投身軍伍，應無先與習蒙古語選之理。〈趙貞肅公祠堂記〉言其「稍長，知讀書，略通大義即去，從虎職」，可以為證。見《高麗史》卷 105，〈趙仁規傳〉，頁 256 上；《高麗墓誌銘集成》，頁 629；《稼亭集》卷 3，〈趙貞肅公祠堂記〉，頁 9 下。
- ¹³ 趙仁規仕宦經歷與平壤趙氏家族的建立，參見〔韓〕閔賢九，〈趙仁規와그의家門（上）〉，頁 18-28。
- ¹⁴ 《高麗史》卷 105，〈趙仁規傳〉，頁 257 上。
- ¹⁵ 《稼亭集》卷 3，〈趙貞肅公祠堂記〉，頁 9 上。
- ¹⁶ 《高麗墓誌銘集成》，頁 631，〈趙仁規墓誌銘〉。
- ¹⁷ 同上注；《高麗史》卷 76，〈百官志一·司宰寺〉，頁 561 下。
- ¹⁸ 《高麗史》卷 105，〈趙仁規傳〉，頁 257 上。關於趙仁規家族聯姻與諸子婿仕宦情形，參見〔韓〕閔賢九，〈趙仁規와그의家門（中）〉，頁 5-32。

可能與趙仁規諸子均以「玉」字行輩有關。¹⁹ 至於義璇生年，可據其兄延壽生於 1278 年，弟瑋生於 1287 年，推定在 1279-1286 年之間。卒年的估算，先據〈趙瑋墓誌〉所載：

戊子（至正 8 年，1348）十一月乙巳，卒于家，享年六十二。……以明年（至正 9 年，1349）三月己未（28 日，新曆 4 月 16 日），葬于松林原。將葬，其兄元朝三藏法師旋公以墓誌屬予曰……。²⁰

知至正九年，義璇尚在人間。另，閔思平（號及菴，1295-1359）《及菴詩集》卷二收錄律詩，其一詩題云：「至正乙未（15 年，1355）菊月（9 月）念四日（新曆 10 月 29 日），訪洪相國平山堂，念順菴夙昔之恩，因贈之以《立誓往西方之文》一軸。庶結來因。」²¹ 是義璇之卒早於 1355 年 10 月。我們可以推得義璇卒年約在 1349 年 4 月至 1355 年 10 月之間。若據上述可能的生卒年而言，其年壽當介於 64-77 歲。《及菴詩集》卷四〈哭順菴三藏〉詩，有「年齊九秩大師翁」句。²² 齊通躋，達到或超越之意；九秩者，九十歲也。以前估義璇大概年壽，不得有九秩之說。

義璇的出家為僧，或與生父趙仁規對佛學的明顯偏好有關。〈趙仁規墓誌銘〉記其專心佛事，曾在宅第聚僧將所印《大藏經》粧成卷帙。仁規罹病深劇，尚將夢中所見觀音像容，命工繪為草圖。病革之時，誠子之語有「宿劫有緣生為同腹」之句，末唸讚佛古偈而逝。²³ 〈趙貞肅公祠堂記〉載仁規「篤於釋教」，將平常起居處所稱為「祇園」，並創建清溪佛寺以為高麗王祝釐，金

¹⁹ 趙仁規另四子名，《稼亭集》卷 3，〈趙貞肅公祠堂記〉記為「瑞、璉、延壽、瑋」（頁 10 上-下）。延壽原名，李叔琪〈趙延壽墓誌銘〉作「翽」，《高麗史·趙延壽傳》則作「翽」，若非〈趙延壽墓誌銘〉釋文有誤，則應以《高麗史》為是。詳見《高麗墓誌銘集成》，頁 450；《高麗史》卷 105，〈趙仁規傳附趙延壽傳〉，頁 258 下。

²⁰ 《高麗墓誌銘集成》，頁 543-544。另見《稼亭集》卷 12，〈高麗國重大匡僉議贊成事上護軍平壤君趙公墓誌〉，頁 2 上-下，引文文字同。

²¹ 〔高麗〕閔思平，《及菴詩集》卷 2，頁 13 上。

²² ；同上注，卷 4，頁 8 上。

²³ 《高麗墓誌銘集成》，頁 630。

書墨印佛典海藏無數。²⁴

趙仁規對文藝的留心，也可在義璇身上見出一定的影響。仁規雖出身軍旅，但非粗鄙無文之輩，不僅「能華言，善辭令」，²⁵ 且「於《四書》傳記稍有留意」，兼善筆法。²⁶ 臨終之際，猶引《詩經》告誡諸子相好毋爭。²⁷ 緣是之故，仁規諸子即便多任武職，而長子瑞「以羽林登第」，²⁸ 時人以「相門儒士」視之，²⁹ 三子延壽「擢第春官」，趙瑞二子宏、千禎亦均「第進士」。³⁰ 至大元年（1308），趙瑞入元受三珠虎符，³¹ 曾先作一詩以呈仁規，仁規已卒未及見，卻頗為膾炙人口。³² 仁規家族之習染文風，從中可以概見。義璇能詩與善寫大字，可能也是承傳自其父。詩文的造詣成為義璇與士人交游往還的重要基礎。

三、脫略富貴輕分離：師承淵源

義璇為趙仁規第四子，與諸兄弟不同，他幼年為僧，終身禮佛，箇中緣由，值得探究。「時代背景」、「家庭影響」與「個人因素」，可能是義璇所以「脫略富貴」的原因。

先從時代背景說起。高麗崇奉釋教，自太祖王建（918-943）立國即已開始。王建定都開州（今北韓開城），先後於城中興建十座佛寺，迎僧師事，備

²⁴ 《稼亭集》卷3，頁8上、10下。

²⁵ 同上注，頁8下。

²⁶ 《高麗墓誌銘集成》，頁630，〈趙仁規墓誌銘〉。

²⁷ 《稼亭集》卷3，〈趙貞肅公祠堂記〉，頁10上。

²⁸ 《高麗墓誌銘集成》，頁631，〈趙仁規墓誌銘〉。

²⁹ 《高麗史》卷105，〈趙仁規傳附趙瑞傳〉，頁257下。

³⁰ 《高麗墓誌銘集成》，頁451，〈趙延壽墓誌銘〉；《稼亭集》卷3，〈趙貞肅公祠堂記〉，頁10下。此處所謂「登第」、「進士」均係在高麗科舉制度之下，而非指元朝科舉。趙瑞等人多係以蔭職任官，再以現職官員資格應試，限制既少，及第率卻高。關於高麗的科舉，參看〔韓〕李成茂著，張璉瑰譯，《高麗朝鮮兩朝的科舉制度》。

³¹ 三珠虎符，又稱虎頭金牌，三品以上高官始得佩帶。見 Ch'i-ch'ing Hsiao（蕭啟慶），*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pp. 171-172.

³² 《高麗墓誌銘集成》，頁631，〈趙仁規墓誌銘〉。

極尊信。³³ 靖宗二年（1036），制命家有四子者，許以一子於靈通、嵩法、普原、桐華等寺出家。³⁴ 文宗十三年（1059），更令「兩京及東南州府郡縣，一家有三子者，許一子年十五剃髮為僧。」³⁵ 趙仁規育有五子，四子義璇的出家，合乎靖、文二宗以來的制令。

次就家庭影響而言。趙仁規晚年篤於佛學，可能對義璇出家為僧有所影響，前已敘及。此外，高麗天臺宗僧人無畏，忠烈王時封為王師，忠肅王（1314-1330；1332-1339）時尊為國統，一說即義璇的俗家叔父。³⁶ 若然，義璇投身佛門，歸宗天臺，或即受無畏的影響。義璇侄普解，亦出家「中天臺教選」，³⁷ 趙仁規家族與高麗天臺宗的關係與法脈的傳承，值得注意。

最後是個人的因素。延祐元年（1314），義璇於開州罹患重病，藥石罔治之際，他向佛恩寺的藥師琉璃光佛像祈禱。當夜，義璇夢有神人傳授靈丹，服用之後，明天疾病隨告痊癒。義璇此後「誓以死奉其教」。³⁸ 當時義璇應已出家數年，生死交關的奇跡見證，更加堅定他向佛的決心。

義璇何時落髮，如何與向誰習法，史闕有間，難以徵實，只能概言。李齊賢（1287-1367）〈妙蓮寺石池竈記〉有義璇「幼時嘗於妙蓮寺」之句，〈妙蓮寺重興碑〉則記其為「圓慧之嫡嗣，無畏之猶子」，³⁹ 可見義璇法脈承傳應係自圓慧、無畏一系而來。⁴⁰ 圓慧生平難以詳考，僅知至元二十一年（1284）妙蓮寺初成，曾在該寺主盟結社，後被尊為國師、國統，為高麗忠烈王所推

33 〔日〕忽滑谷快天著，朱謙之譯，《韓國禪教史》，頁 110-111；何勁松，《韓國佛教史》（下卷），頁 14-18。

34 《高麗史》卷 6，〈靖宗世家〉，二年五月己卯條，頁 257 上。

35 同上注，卷 8，〈文宗世家二〉，十三年八月丁亥條，頁 116 上。

36 李齊賢稱義璇為「無畏之猶子」，猶子既可指為侄子，亦可解為曾受無畏之教。這是義璇與無畏關係的唯一佐證。就前後文義以觀，此處應係指義璇法脈承傳自無畏，似非謂無畏為義璇之叔父。關於無畏事跡，以朴全之所撰〈靈鳳山龍巖寺重創記〉為詳，惜無一語提及其俗家家世。見〔高麗〕李齊賢，《益齋亂藁》卷 6，〈妙蓮寺重興碑〉，頁 27 上；〔朝鮮〕徐居正編，《東文選》卷 68，頁 12 下-15 下，〔高麗〕朴全之，〈靈鳳山龍巖寺重創記〉。

37 《稼亭集》卷 3，〈趙貞肅公祠堂記〉，頁 11 上。

38 同上注，〈高麗國天臺佛恩寺重興記〉，頁 1 上。

39 《益齋亂藁》卷 6，頁 24 下、27 上。

40 《韓國天臺宗聖典·宗史篇》，追溯高麗天臺宗的法脈承繼，圓慧、無畏以降即係義璇。見韓國天臺宗總務院，《韓國天臺宗聖典》，頁 394-399。

重。⁴¹ 義璇得被目為「圓慧之嫡嗣」，或是其在妙蓮寺出家而師從圓慧之故。圓慧三傳以至無畏。無畏字混其，號牧庵，「自童孩至於長成」，受到圓慧慈愛訓誨。⁴² 大德六年（1302），忠烈王迎主妙蓮寺，後歷住金藏、國清、瑩原、龍巖諸寺，累封王師、國師、國統。延祐五年（高麗忠肅王 5 年，1318）入住龍巖寺，其後事跡不詳。⁴³ 無畏好游歷，知音律，善吹笛，⁴⁴ 能屬文，⁴⁵ 義璇既為其法脈承接者，二人關係自是匪淺。

義璇出家時間的推定，二條史料可以注意。

其一是所謂「趙妃詛咒案」。這是忠烈王二十四年（元成宗大德 2 年，1298）發生的一場政治風暴。⁴⁶ 此年，忠烈王原已先行禪位於忠宣王（1298；1309-1313），卻因宮門外的匿名貼書，掀起波瀾。貼書內所欲揭露的，是趙仁規妻為使忠宣王獨鍾其女，教唆巫人咒詛元朝薊國大長公主寶塔實憐（?-1343）不得王寵。⁴⁷ 大長公主知悉後，憤而上書元廷，元廷隨遣使至高麗進行處置：逼迫忠宣王遜位，復立忠烈王，將仁規及其妻下獄，並囚其子瑞、璉、瑒與婿朴義、盧穎秀等及妻。⁴⁸ 隔年，仁規被杖流配置京兆路（今陝西西

⁴¹ 《益齋亂藁》卷 6，〈妙蓮寺重興碑〉，頁 26 下。

⁴² 《東文選》卷 111，頁 12 上-下，〔高麗〕釋無畏，〈薦法兄圓慧國統疏〉。

⁴³ 同上注，卷 68，頁 12 下-15 下，〔高麗〕朴全之，〈靈鳳山龍巖寺重創記〉。

⁴⁴ 《益齋亂藁》卷 4，〈洪南陽奎聞妙蓮無畏國師善吹笛，自袖中箏，入方丈請之。國師為作數弄〉，頁 11 下-12 上。〔高麗〕李穡，〈牧隱藁·詩藁〉卷 5，〈洪南陽奎聞妙蓮無畏國師善吹笛，自袖中箏，入方丈請之。師為作數弄〉，頁 2 上。《及菴詩集》卷 3，〈伏蒙宗伯益齋公錄示近所為詩數篇。……拜呈左右〉，頁 1 下。

⁴⁵ 釋無畏未有文集、語錄傳世，其文散見於《東文選》，存〈孤石亭記〉、〈圓慧國統祭文〉、〈代人薦母疏〉、〈薦法兄圓慧國統疏〉四篇，分見該書卷 68，頁 4 上-下；卷 109，頁 25 上-下；卷 111，頁 3 上-下，頁 12 上-下。

⁴⁶ 〔韓〕閔賢九，〈趙仁規斗그斗家門（上）〉，頁 24-27；蕭啟慶，〈元麗關係中的王室婚姻與強權政治〉，頁 244。

⁴⁷ 《高麗史》卷 105，〈趙仁規傳〉，頁 256 下；同書卷 89，〈后妃傳二·薊國大長公主〉，頁 21 上。

⁴⁸ 同上注，卷 89，〈后妃傳二·薊國大長公主〉，頁 21 上。同書〈趙仁規傳〉記仁規二婿名為崔冲紹與朴瑄。《元史》記趙仁規被執入元事，並及崔冲紹，唯未言二人為翁婿。見《元史》卷 20，〈成宗紀三〉，大德三年正月壬辰條，頁 425；同書卷 208，〈外夷傳一·高麗〉，頁 4622。

安），六年之後始得返還高麗。⁴⁹ 這場趙仁規家族遭遇到的最大政治危機，被執囚的仁規子婿名單中，未見義璇及其弟趙瑋之名。趙瑋未受波及的原因不明，義璇則可能與其早已出家為僧有關。

其二是方于宣至大元年（1308）為趙仁規撰寫的墓誌銘。義璇投入天臺宗，且中禪選上上科，當時法階已為禪師，並住持高麗珍丘寺。⁵⁰ 新羅末期，三韓佛教形成「五教九山」的局面，「五教」包括戒律宗、法相宗、法性宗（三論宗）、圓融宗（華嚴宗）與涅槃宗，九山則指禪宗的九個本山。在義天（1055-1101）自宋習法並返回高麗傳佈天臺思想前，高麗天臺宗尚未能得到真正的發展，五教九山並無其一席之地。而在義天之時，天臺宗因得到統治者支持，又符合當時佛教發展的內在需要，傳播迅速，地位大幅提昇。⁵¹ 至高麗中後期，佛教宗派已由「五教九山」變為「五教二宗」，五教未改，「二宗」則指禪寂宗（曹溪宗）和天臺宗。⁵² 是故，義璇雖入天臺，但所中僧科屬於禪選，所晉法階亦為禪宗系統。僧科是由國家甄拔僧人的考試制度，大概於高麗時期確立，分為禪宗和教宗二個系統。其中，禪宗法階序次大體為「大選—大德—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禪師—大禪師」，禪宗各派僧侶於大選中合格以取得初階，其後便循序晉升。⁵³ 從至大元年義璇已臻禪師法階來看，他的出家應遠早於此時。

義璇出家的妙蓮寺，在高麗佛教史上的地位，除係天臺宗重要寺院外，另有二個特出之處。

首先，此寺為高麗忠烈王與齊國大長公主忽都魯揭里迷失（1259-1297）所修，成為其後諸王臨幸祝釐之所。《高麗史》自忠烈王九年（1283）六月始見王與公主幸妙蓮寺的記載，⁵⁴ 其後即屢見不一見：或幸臨該寺，⁵⁵ 或設法

49 《高麗墓誌銘集成》，頁 631，〈趙仁規墓誌銘〉。《元史》卷 20，〈成宗紀三〉，頁 425；同書卷 208，〈外夷傳一·高麗〉，頁 4622。《高麗史》卷 105，〈趙仁規傳〉，頁 256 下。

50 《高麗墓誌銘集成》，頁 631。

51 何勁松，〈天臺宗在日本和韓國的傳承與發展〉，頁 80-83。

52 〔日〕忽滑谷快天著，朱謙之譯，《韓國禪教史》，頁 196、278-281。

53 〔韓〕金煥泰著，柳雪峰譯，《韓國佛教史概說》，頁 116-118；何勁松，《韓國佛教史》（下卷），頁 31-33。

54 《高麗史》卷 29，〈忠烈王世家二〉，頁 462 下。

55 《高麗史》卷 29-41 僅記「幸妙蓮寺」者，不勝備舉，相關資料的集錄，可以參

會，⁵⁶ 或轉藏經，⁵⁷ 或為元帝祝釐，⁵⁸ 或行香追福。⁵⁹ 忠烈王二十八年（1302）更於此寺為忽都魯揭里迷失設置影堂，⁶⁰ 遇其忌辰輒至寺內行香。⁶¹ 忠烈、忠宣二王真容且於該寺供奉。⁶² 受到中國原廟（神御殿、影堂）制度的影響，韓國崇祀國王御真，新羅時代已發其端，高麗時期確立影殿制度：中央設置景靈殿，並於地方擇寺建立影殿，奉祀先王御容。⁶³ 天臺宗妙蓮寺既被選為忠烈王及王妃與忠宣王等人真容奉祀之所，義璇在該寺出家，或幸得觀禮於忌辰行香之時，對日後入元奉旨住持元朝明宗帝后影堂所在的大天源延聖寺，想必有所助益。

復次，該寺為當時文人雅集聚會之地。至正十四年（1354）進士李穡（1328-1396）曾追憶其「年十六七，喜從詩僧游。至妙蓮寺，儒釋雜坐，啜茶聯句。」⁶⁴ 韓脩（1333-1384）更是「少小就妙蓮，讀書五寒暑」，屢有詩作憶想彼段時光。⁶⁵ 義璇喜從詩人文士交游，妙蓮寺的僧俗詩會傳統或許多少產生影響。

義璇入元以前，在高麗已歷住珍丘、萬義、瑩原諸寺。其間行事已難詳知，唯主持水原（今南韓京畿水原）萬義寺時之事跡稍可考述。請從《高麗史》的記敘說起。《高麗史》載及義璇其名與事跡者，僅見於趙仁規附趙延壽傳中，寥寥數語：

看〔日〕齋藤忠，《高麗寺院史料集成》，頁 681-683。

⁵⁶ 《高麗史》卷 29，〈忠烈王世家二〉，頁 464 上；同書卷 30，〈忠烈王世家三〉，頁 466 上。

⁵⁷ 同上注，卷 31，〈忠烈王世家四〉，頁 495 上。

⁵⁸ 同上注，卷 32，〈忠烈王世家五〉，頁 495 下、503 下、505 上。

⁵⁹ 同上注，頁 499 上。

⁶⁰ 同上注，頁 500 上。

⁶¹ 同上注，卷 34，〈忠肅王世家一〉，頁 532 下。

⁶² 《益齋亂藁》卷 6，〈妙蓮寺重興碑〉，頁 27 上。

⁶³ 〔日〕小川裕充，〈北宋時代の神御殿と宋太祖、仁宗坐像について——その東アジア世界的普遍性〉，頁 22-23；〔韓〕趙善美，〈韓國肖像畫的類型與特徵〉，頁 39。關於高麗影殿制度的研究，前揭二文討論尚少，筆者擬另文考述。

⁶⁴ 〔高麗〕李穡，《牧隱藁·文藁》卷 15，〈韓文敬公墓誌銘并序〉，頁 25 下。

⁶⁵ 〔高麗〕韓脩，《柳巷詩集》，〈題高達寺〉，頁 14 下-15 上；同書，〈題休上人詩卷，得學字〉，頁 19 上；〈嚴光大禪師寄惠芽茶〉，頁 23 上。

延壽一門貴盛，乘勢使氣，其弟僧義璇奪占寺院，贊成事朴虛中坐都堂斥其罪。延壽右義璇，虛中執不可，延壽遂辱罵之。⁶⁶

概為一負面評語。我們不妨據以對照《陽村集》的另一段文字：

水原之東數十里，有寺曰「萬義」，裨補古刹也。壞廢既久，鞠為榛莽。皇慶間，天臺珍丘寺住持大禪師混其來觀遺址，重營以新，三藏璇公繼而主之，申啟于上，判屬妙蓮。門人相傳，歲紀已遠，實為天臺作法之社。⁶⁷

可知《高麗史》所謂義璇「奪占寺院」一事，或即指義璇住持萬義寺時，申啟將該寺「判屬妙蓮」。不過，義璇究係非法奪占，抑或合法申請，受限資料，今已無從索考。

四、西遊卻被玉皇眷：住錫大都

義璇入元的時間與方式，學者頗見異說。若據張言夢所言，義璇大約在泰定帝時（1323-1328）應召至中國，受元帝賜號三藏法師，並命駐錫大都大天源延聖寺。⁶⁸ 而桂栖鵬則云：「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高麗忠肅王命義璇入元，主報恩光孝（引者按：應作「教」）寺事，入元未久，元廷命義璇住持大都天源延聖寺」。⁶⁹ 張、桂二氏所述，顯有出入，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考辨分析。

先論義璇入元時間的推定。李穀〈高麗國天臺佛恩寺重興記〉載義璇重修佛恩寺始末，其文撰於後至元四年（1338），時值義璇將自高麗返回大都之際。該文內有義璇「居輦轂亦且十五年」云云，⁷⁰ 可據以推估義璇入元約在

⁶⁶ 《高麗史》卷 105，〈趙仁規傳〉，頁 258 下。

⁶⁷ 〔高麗〕權近，《陽村集》卷 12，〈水原萬義寺祝上華嚴法華會眾日記〉，頁 2 上-下。

⁶⁸ 張言夢，〈元代來華高麗僧人考述〉，頁 40。

⁶⁹ 桂栖鵬，〈入元高麗僧人考略〉，頁 58。

⁷⁰ 《稼亭集》卷 3，頁 2 上。

1323 年前後，亦即在英宗至治三年左右。張、桂二氏所言入元時間，張氏庶幾近之，桂氏則不盡正確。

再言入元的方式。張言夢所謂義璇「應召來到中國」，註引李穀之文，實未能作此推測。若據本文〈引言〉所錄李穀詩，內有義璇「西遊却被玉皇眷」之句，其入元恐非應召。我們不得不對張氏之說存疑。至於桂栖鵬有「高麗忠肅王命義璇入元」之說，所據失註，應係自李穀〈京師報恩光教寺記〉推衍而來。為便討論，容錄相關原文如下：

今上（引者按：指順帝）即位之年（至順 4 年，1333）三月，今高麗國王暨瀋王，以父王遺令，召本國天臺師、住持瑩原寺、重大匡慈恩君、特賜定慧圓通知見無礙三藏法師旋公主其寺。⁷¹

可見義璇確是奉當時高麗忠肅王與瀋王之召，擔任大都報恩光教寺住持。所謂的「父王遺令」，指的是忠宣王璋（蒙古名「益智禮普化」）臨終（1325）前的囑咐。王璋虔誠向佛，「酷嗜浮屠法」，⁷² 曾多次到大都，尤其在大德二年（1298）入朝以至於延祐七年（1320）被流放期間，除短暫返回高麗外，幾乎在大都生活達二十年之久。在大都時，王璋熱衷於舉行各種佛事活動，⁷³ 買地創建報恩光教寺（1317-1319）即在此際。光教寺建成後，王璋迭請中國天臺、華嚴二宗僧人主持，王璋卒後，寺事漸廢，至此始由忠肅王與瀋王召請義璇駐錫。王璋遺令如何，記文無載，但王璋對高麗天臺宗僧人無畏的尊崇，以及義璇同胞姊妹曾為其王妃的情誼，都值得我們注意。不過，這條材料可以佐證義璇被召駐錫的時間，據以為應召入元，似非的解。以下即將提到的一條材料，可以證明義璇至少於至順三年（1332）已在大都活動。⁷⁴

⁷¹ 《稼亭集》卷 2，頁 5 下。

⁷² 《益齋亂藁》卷 9 上，〈有元贈……忠憲王世家〉，頁 18 下。

⁷³ 〔日〕北村高，〈高麗王王璋の崇佛〉，頁 117-141。

⁷⁴ 《高麗史》載至大元年（1308）趙仁規將卒之際，「諸子在元，唯璉侍疾」，〈趙仁規墓誌銘〉記「諸子皆乘駟入朝，唯二子璉侍側」，〈趙貞肅公祠堂記〉有「時諸子赴都，唯忠肅（引者按：即趙璉）侍側」云云。三處史文所述，均係指趙瑞等人入元受三珠虎符一事，所謂諸子，已出家之義璇（時住持珍丘寺）並不在列。見《高麗史》卷 105，〈趙仁規傳〉，頁 257 上-下；《高麗墓誌銘集成》，頁 630，〈趙仁規墓誌銘〉；《稼亭集》卷 3，〈趙貞肅公祠堂記〉，頁

義璇奉命住錫大天源延聖寺的時間，尚難確考。現可徵知義璇與延聖寺相關史料，應以《禮念彌陀道場懺法》為最早。該書卷一錄日本沙門至道〈重刊《禮念彌陀道場懺法》序〉，述義璇捐資鳩工梓行事，文內稱義璇為「大都大天源延聖寺高麗三藏法師」，末署時為至順三年（1332）七月。⁷⁵ 據此可知義璇在至順三年七月以前已在大都，而非奉忠肅王召方始入元。不過，此時義璇是否已為延聖寺住持，尚難斷言。後至元二年（1336），義璇奉詔還本國降香時，⁷⁶ 署銜已是「特賜定慧圓通知見無礙三藏法師，大天源延聖寺、大報恩光教寺兼高麗瑩原寺住持，福國祐世靜明普照玄悟大禪師，三重大匡慈恩君」。⁷⁷ 二年後再返大都，應續住延聖寺。至正元年（1341），李穀在為義璇父趙仁規撰寫祠堂記時，尚稱「今……三藏法師旋公住錫燕山」云云，可以為證。而比照後至元二年所錫法銜，此時義璇已無大報恩光教寺住持之名，大概業已去任。此後的事跡隱晦，文獻未見記載，僅知弟子熙菴繼為住持（當不晚於 1355 年），直至明兵攻入大都，元朝滅亡。⁷⁸

義璇為元帝眷顧，李穀謂係「荷天眷而膺恩命」，⁷⁹ 主要表現於二事：一是受旨住持大天源延聖寺，一是奉命出使降香高麗。

請從義璇住持大天源延聖寺論起。延聖寺位於大都城內太平坊，俗名黑塔寺，為泰定帝所興建，先後成為顯宗與明宗帝后的神御殿寺，是元代中後期一座相當重要的皇家寺院。顯宗甘麻刺不曾登基，泰定帝以此寺作為生父的影堂，反映的是蒙元時期「重本生而輕正統」的觀念。泰定帝死後，顯順二宗兄弟的子嗣之爭再起，終由順宗之孫文宗（1328-1329；1329-1332）獲勝。於是泰定帝不僅未得被迫贈廟號，其父顯宗在太廟的牌位與延聖寺的影堂亦均遭撤廢。此後帝位穩掌於順宗一脈，顯宗影堂遂未能恢復。⁸⁰ 順帝（1333-1368）再度選中延聖寺以為明宗帝后原廟，用意並不清楚。不過，順帝其後既未再為父皇別建新寺，亦不為己建造寺院，看似與元代諸帝建寺以為先祖或身後影堂的傳統有所扞格，卻也略見順帝對文宗所熱衷的原廟寺觀建置，似乎並不積

10 下。

⁷⁵ [金]王子成集，《禮念彌陀道場懺法》卷 1，頁 75 下。

⁷⁶ 《益齋亂藁》卷 6，〈妙蓮寺重興碑〉，頁 27 上。

⁷⁷ 《稼亭集》卷 3，〈高麗國天臺佛恩寺重興記〉，頁 1 上。

⁷⁸ 熙菴事跡，下文另有考述，茲請從略。

⁷⁹ 《稼亭集》卷 3，〈高麗國天臺佛恩寺重興記〉，頁 2 上。

⁸⁰ 洪金富，〈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頁 32。

極。⁸¹ 無論如何，作為順帝皇考妣的神御寺，延聖寺的地位自非泛泛。義璇受封「特賜定慧圓通知見無礙三藏法師」號，三藏法師係指對精通佛教聖典中經、律、論三藏者的尊稱，《元史》所載得受「三藏」法號者極少，受賜者多係西僧，身分往往極為尊貴。⁸² 義璇得受此號，推崇已見一斑，奉旨住持延聖寺，身份更是崇高。

元代皇家佛寺住持例由皇帝親自選任大德高僧，就現有的相關記載來看，這些駐錫僧人主要出自華嚴宗的寶集寺系統，⁸³ 另有一些律宗的法師。宋代以來的佛教，大致可分為禪、教、律三教，⁸⁴ 宋人也稱之為三宗：禪是禪宗，以臨濟與曹洞為主；教指禪宗外諸宗，包括天臺宗、華嚴宗和淨土宗（以淨土信仰寓於諸宗）；律是律宗，實即律學。各宗頗可互相融通，彼此並非涇渭分明。⁸⁵ 元朝皇家寺院住持多由教宗、律宗僧侶出任，有學者認為這是貫徹元世祖以來「抑禪扶教」方針的結果。⁸⁶

眾所周知，元廷崇佛，尤信藏傳密宗佛教。除大護國仁王寺係帝師居所外，⁸⁷ 何以不多任密宗喇嘛以為各皇家寺宇的住持？這是筆者久思不得其解的疑問。有學者撰文討論寶集寺知揀生平時，對知揀得以漢地華嚴宗法師身份入主大聖壽萬安寺的原因，提出解釋。該文主要的論點，在於華嚴宗與密教同屬教門，二教對世界的認識亦基本一致。⁸⁸ 佛教義理，非我所悉，設若其推論屬實，那麼凡教門諸宗世界認識論近於密宗者，似應均可出任皇家寺院主持。其

⁸¹ 詳見拙著，〈元大都大天源延聖寺考論〉。

⁸² 《元史》卷 27，〈英宗紀一〉，頁 601；同書卷 35，〈文宗紀四〉，頁 778、779；卷 202，〈釋老傳·必蘭納識里〉，頁 4520。

⁸³ 關於元代寶集寺的發展，詳見〔日〕竺沙雅章，〈燕京·大都の華嚴宗——寶集寺と崇國寺の僧たち〉，頁 218-224。

⁸⁴ 元代情形亦復如是，見《元史》卷 202，〈釋老傳〉，頁 4524：「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

⁸⁵ 楊曾文，《宋元禪宗史》，頁 4。

⁸⁶ 陳高華，〈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頁 6。如考量位於大都以外的皇家佛寺，尚得見禪宗僧人出任住持，如集慶路的大龍翔集慶寺就由著名禪師——笑隱大訥主持。關於釋大訥的生平事跡，請見陳得芝，〈論元代的「詩禪三隱」〉，頁 513-520。

⁸⁷ 〔日〕中村淳，〈元代法旨に見える歷代帝師の居所——大都の花園大寺と大護國仁王寺〉，頁 57-82。

⁸⁸ 黃春和，〈元代大聖壽萬安寺知揀事迹考〉，頁 35。

中應尚有進一步論證的空間。

筆者認為忽必烈「陸教居禪之右」，⁸⁹ 推行「崇教抑禪」政策，⁹⁰ 政策方針大致為其後元帝所沿承，至少充分展現在皇家寺院住持選任方面。不過，元廷並非一味提升教門地位，而仍冀以其最為崇信的藏傳佛教進行統籌，主要方法有二：一係大都地區的皇家寺院，特別是地位崇高的帝后神御殿寺，建築均採藏傳佛教的風格。諸寺之中，又以帝師所在的大護國仁王寺最為尊貴。⁹¹ 二為至元九年（1272），忽必烈曾下旨「集諸路僧受戒」，「贊頌稱旨」者「賜法衣一襲，受戒於國師，加號吉祥」。⁹² 此外，在將教門地位提高時，又往往「別賜茜衣以旌異之」。⁹³ 茜衣為絳紅色袈裟，係喇嘛衣裝，釋宗泐（1318-1391）有「茜衣紅帽雜蕃僧」之句，⁹⁴ 可以為證。凡此均圖將漢地僧人納入藏傳佛教之下，特別是作為國師的受戒弟子，萬安寺住持知揀即有「揀吉祥」之號，漢僧帶吉祥號者，元代文獻亦屢見不鮮。⁹⁵ 綜而言之，元廷雖多以教門法師為皇家梵宇住持，但一來以藏密風格修建寺院，並統歸於帝師所主的大護國仁王寺，二則以藏傳佛教加於漢地僧眾之上，崇教抑禪之外，復寓密宗於其上。

義璇以一高麗天臺宗僧人，為何能獲元帝寵眷而得主持皇家寺院，其間緣由，受限資料，已難深究。皇帝個人主觀偏好，可以無論，但有幾個因素可以留意：

其一是高麗天臺宗的教派歸屬。天臺宗在高麗雖被畫入禪宗，與曹洞宗並稱「兩宗」，所晉法階亦循禪宗系統，但高麗天臺原屬華嚴道統，⁹⁶ 中國天臺宗則屬教門。選用天臺宗僧人為住持，仍係崇教抑禪的一種表現。

⁸⁹ 〔元〕劉仁本，《羽庭集》卷5，〈送大璞玳上人序〉，頁43上。

⁹⁰ 〔元〕姚燧，《牧庵集》卷15，〈董文忠神道碑〉，頁20下。

⁹¹ 請見姜東成，〈元大都敕建佛寺分佈特點及建築模式初探〉；〔日〕中村淳，〈元代大都の敕建寺院をめぐって〉，頁63-83；拙著，〈試論元代原廟的宗教體系與管理機關〉，頁54-79。

⁹² 〔元〕胡祇遯撰；魏崇武、周思成校點，《胡祇遯集》卷17，〈磁州嘉福寺賢公講主碑〉，頁374。黃春和亦注意到此條史料，但誤撰者胡祇遯為高翻。見黃春和，〈元代大聖壽萬安寺知揀事迹考〉，頁36。

⁹³ 《羽庭集》卷5，〈送大璞玳上人序〉，頁43上。

⁹⁴ 〔明〕釋宗泐，《全室外集》卷6，〈和蘇平仲見寄〉，頁11上。

⁹⁵ 黃春和，〈元代大聖壽萬安寺知揀事迹考〉，頁36。

⁹⁶ 韓國天臺宗總務院，《韓國天臺宗聖典》，頁372。

其二，高麗僧入元，以元中後期為盛，細究桂栖鵬輯考三十一位麗僧來華的時間，可以為證。⁹⁷ 高麗國王王璋於武仁二朝在大都的長期居留，頗受皇帝優遇，兼以篤好佛法，可能是入元麗僧明顯增加的主因。為數眾多的高麗法師來到中國，大都尤為其必經與常居之地，勢力日大，從中任命皇家寺院住持，似亦有其考量。

其三是天臺宗對懺法、懺儀的高度重視。宋代以來天臺宗修懺理論的建立與完善，各種懺悔儀式、制度的出現，擴大了懺法的意義與用途，逐漸形成經由念經拜懺以求消災祈福、超度亡靈的各類經懺。⁹⁸ 義璇捐資重刊《禮念彌陀道場懺法》，至道撰序譽以「久默斯要」，⁹⁹ 可見應熟習懺法。神御殿寺供祀先帝后影像，是一種追薦先人的表現，選任嫻於懺法的法師，實有可能。

其四，李穀曾為義璇真容作贊，有「錦袍茜帽，安用緇衣」之句。¹⁰⁰ 茜帽，《解醒語》云：「國初起圓殿於西宮中以居西僧，僧官皆著茜帽」，¹⁰¹ 《梧溪集》有「茜帽番僧」之語，¹⁰² 《皇元風雅後集》亦見「茜帽僧官躍馬來」，¹⁰³ 可知既為僧官身份的表徵，也係西僧衣著之形象。大天源延聖寺初建之際，泰定帝即敕令諸色人匠總管府依照由帝師指授繪成的規制，修造該寺的前後殿與四角樓等建築，其正殿的光焰佛座與幡杆則仿大承華普慶寺製作，顯然為藏傳佛教的寺宇。元廷更屢命帝師於此興作佛事，每年的四月八日，尚有以帝師刺麻堂與白塔（大聖壽萬安寺）、青塔（大永福寺）與黑塔（大天源延聖寺）為首舉辦的浴佛之會。可見延聖寺與帝師的關係十分密切。¹⁰⁴ 義璇著茜帽錦袍，固然表示其地位之非凡，或許也不免沾染些許藏傳佛教的色彩。

可惜的是，義璇入元以至於住持大天源延聖寺期間的行事，元麗文獻不足徵，尤其中國方面史料毫未見載，除曾刻印佛經外，幾未見與中原人士往還唱

⁹⁷ 桂栖鵬，〈入元高麗僧人考略〉，頁 58-62。

⁹⁸ 宋代天臺懺法的興盛，詳見潘桂明、吳忠偉，《中國天臺宗通史》，頁 538-580。

⁹⁹ 《禮念彌陀道場懺法》卷 1，頁 75 下。

¹⁰⁰ 《稼亭集》卷 7，〈順菴真讚〉，頁 12 下-13 上。

¹⁰¹ 〔元〕李材，《解醒語》，頁 6 上。

¹⁰² 〔元〕王逢，《梧溪集》卷 3，〈歎病駝〉，頁 476。

¹⁰³ 〔元〕傅習、孫存吾，《皇元風雅後集》卷 5，〔元〕郭君彥〈入京五首〉，頁 6 下。

¹⁰⁴ 詳見拙著，〈元大都大天源延聖寺考論〉。

和的記錄。義璇「入中國，知名儒釋間」，¹⁰⁵ 又與李穀「數載燕都幸作隣，勝游不問暮兼晨」，¹⁰⁶ 二人過從甚密，多有唱和。而李氏是高麗文士與元朝文士交往最為密切的人之一，¹⁰⁷ 往還游歷之際，除李穀外，元朝文士竟無片語隻字言及義璇，似乎是不合情理的。¹⁰⁸ 文獻的佚失不存，或許是主要的原因。無論是後至元六年（1340）四月，順帝下詔為明宗在大天源延聖寺所樹立的神御殿碑，¹⁰⁹ 抑或至正三年（1343）敕令揭傒斯（1274-1344）撰寫的〈明宗神御殿碑〉，¹¹⁰ 相信對這位長年住持該寺的高麗僧人應會有所記述，惜二碑均已佚失，無從查索。¹¹¹

巧合的是，史闕有間的情形，同樣發生於另一位曾任大都皇家寺院住持的高麗僧人——海圓（?-1340）。海圓為高麗瑜珈教（慈恩宗）師，仁宗皇慶元年（1312）「領其徒入居」大崇恩福元寺，直至示寂，前後凡二十九年。地位之崇高，不言可喻。此人生平梗概仍可見諸李穀為其所撰碑中，¹¹² 但元朝方面的文獻則同付闕如。¹¹³

¹⁰⁵ 《稼亭集》卷 3，〈高麗國天臺佛恩寺重興記〉，頁 2 上。

¹⁰⁶ 同上注，卷 18，〈送順菴奉使東歸〉，頁 5 下。

¹⁰⁷ 陳高華，〈《稼亭集》、《牧隱稿》與元史研究〉，頁 333。

¹⁰⁸ 元時漢族與非漢族之間的社會、文化互動頻繁，各族士人（包括僧人）因共同興趣與品味而常相聚會，多見詩文唱酬。詳參蕭啟慶，〈元朝多族士人的雅集〉，頁 179-204。有元一代，高麗歸為漢族，兩國文士交往更形頻繁，義璇喜附風雅，又是能詩之輩，不應無跡可尋。

¹⁰⁹ 《元史》卷 40，〈順帝紀三〉，頁 855。後至元二年十月，順帝已令參知政事納麟監繪明宗御容，至正二年二月，又命予以織造。分見《元史》卷 39，〈順帝紀二〉，頁 836；同書卷 40，〈順帝紀三〉，頁 863。御容既未織成，何以後至元六年即敕命立碑，令人費解。

¹¹⁰ 歐陽玄（1283-1357）與黃潛（1277-1357）為揭氏所作墓誌銘與神道碑中，以至於《元史·揭傒斯傳》，均繫其事於揭氏至正三年致仕請歸之後。揭氏傳記資料請參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附錄一·傳紀〉，頁 465-482。

¹¹¹ 揭傒斯所撰神御殿碑，危素（1303-1372）尚得目見並誌跋語。危氏跋語扼要概括，未及神御殿形制與寺院建置，殊為可惜。見〔元〕危素，《危太樸文續集》卷 9，〈恭跋明宗皇帝神御殿碑〉，頁 8 下。

¹¹² 《稼亭集》卷 6，〈大崇恩福元寺高麗第一代師圓公碑〉，頁 10 下-13 下。

¹¹³ 略有不同的是，福元寺並不乏碑記存世。姚燧曾撰〈崇恩福元寺碑〉，碑成於至大四年（1311），未記海圓主持之事，事屬當然。見《牧菴集》卷 10，頁 8 下-11

最後要考述的，是義璇奉命出使返回高麗行香之事。就所知言，此次義璇降香祝釐，中國史料依然無載。不過，高麗方面的文獻卻頗有記述。後至元二年（高麗忠肅王復位 5 年，1336），義璇奉順帝之命出使高麗以行香祝釐，回到闊別十五年的故土，二年之後始返大都。義璇行香高麗期間，主要事跡見於重修其天臺宗的二座寺院——妙蓮寺與佛恩寺。妙蓮寺在高麗佛教史上的地位，已如前述。此寺為忠烈王與忽都魯揭里迷失修建，至元二十一年（1284）落成，由釋洪恕開山，後忠烈王國師圓慧、忠宣王國師無畏歷住之，備受尊禮。義璇落髮承襲天臺法脈於此，此次返國，已然歷經六十年之久的妙蓮寺，頗見其「棟宇之撓傾，蓋瓦級輒之腐且缺。」¹¹⁴ 義璇以妙蓮寺為「忠烈、忠宣之祇園也，其真容故在。殿下葺而新之，奉先之孝，孰此為大」，藉以說服忠肅王出資施捨，「撓者繕，傾者立，腐者易，缺者補」，寺容煥然一新。義璇善寫大字，親自金書佛殿匾額。忠肅王特命李齊賢撰文記之。¹¹⁵

佛恩寺與義璇的因緣，前文曾據以為其堅定向佛決心的論證。延祐元年（1314），義璇禱藥師佛像而病癒後，即於是年施財雇工，塑像、建殿、擴堂廡，工期長達二十餘年，在義璇將還大都之際（1338）告竣。義璇特別委請同在高麗的故里好友李穀撰文為記。稼亭記文，除稱道義璇興復該寺之功外，文中且對義璇的生平事跡有相當簡要的述評：

公以衣冠貴胄，而能勇於謝世。既而入中國，知名儒釋間，遂荷天眷而膺恩命，光耀宗門，名標國史。又承國王待遇之重，進階一品，俾冠僧流，真所謂領袖萬僧者矣。人固有得意而渝其志者，公出入中外，榮寵如此，而居輦轂亦且十五年……。¹¹⁶

這可作義璇一小傳讀，更是本文〈引言〉所錄李穀詩句的絕佳腳註。所謂「承國王待遇之重，進階一品，俾冠僧流」云云，殆指義璇所署「三重大匡」之

下。姚燧碑記外，一說當時趙孟頫與元明善也曾奉敕撰文，今均不存。參《牧菴集·附錄》，〔元〕劉致，〈年譜〉，頁 20 下-21 上。順帝時，歐陽玄曾奉旨撰碑，亦佚。歐陽玄撰碑時間的考辨，請見拙著，《元代原廟制度初探》，頁 33 註 186。

¹¹⁴ 《益齋亂藁》卷 6，〈妙蓮寺重興碑〉，頁 26 下-27 上。

¹¹⁵ 同上注，頁 27 上-下。

¹¹⁶ 《稼亭集》卷 3，〈高麗國天臺佛恩寺重興記〉，頁 2 上。

銜，該銜為高麗正一品的文散階。¹¹⁷ 義璇於至順四年（1333）受忠肅王召主報恩光教寺，時尚為從一品的「重大匡」，李穀為撰〈高麗國天臺佛恩寺重興記〉，已以「三重大匡」稱之。義璇此時的法階也由禪師晉為大禪師。這些寵異應均是忠肅王所加，從中足見義璇在當時高麗佛教所居「領袖萬僧」的地位。義璇身份的提昇，李穀記文所謂「入中國，知名儒釋間」是一大關鍵。這固然由於得受元帝命住持皇家佛寺，又奉旨返國行香，的是寵眷異常，值得大書特書，而就現有文獻言，義璇入元前在高麗事跡與交游隱晦，生平行事相關記載集中於入元之後，也反映了這個事實。

五、有儒釋賓友之歡：交游法嗣

前文述及，義璇能詩並善大字，可能承傳自其生父，而詩文的造詣則成為與士人交游往還的重要根本。義璇興之所至，往往「作字如斗，題詩滿紙」，¹¹⁸ 可惜詩字具已無存。義璇曾為妙蓮寺金書佛殿額，¹¹⁹ 亦為雞林府（今南韓慶州）公館西樓大書「倚風樓」三字，¹²⁰ 均係雅擅大字的表現。至於詩作，現僅能自他人的唱酬次韻，略見其概。¹²¹ 今可考知與義璇往還唱和者，均係高麗士人，此節擬略述以見其交游情形，並及義璇門徒熙菴，以觀其法嗣傳承。

義璇與李穀情誼最為深篤。

李穀（1298-1351），高麗人。延祐七年（1320）中本國秀才，泰定三年（1326）中元征東省鄉試，明年赴大都會試，不利。其後始登元統元年（1333）進士第，初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正八品）。隔年奉興學詔返高麗，至元元年（1335）至大都任職。至元三年到至正元年（1341）回本國任官。至正元年再赴大都，八年還國，十一年卒。穀仕元，官至征東行省左右司郎中（從五品），本國仕至都僉議贊成事（正二品）。穀與元朝文士交往密切，

¹¹⁷ 《高麗史》卷 77，〈百官二·文散階〉，頁 581 下。

¹¹⁸ 《稼亭集》卷 4，〈虛淨堂記〉，頁 8 下。

¹¹⁹ 《益齋亂藁》卷 6，〈妙蓮寺重興碑〉，頁 27 上。

¹²⁰ 《稼亭集》卷 10，〈雞林府公館西樓詩序〉，頁 2 上。

¹²¹ 詩題略可徵知者，有〈神馬歌〉與〈六句吟〉二篇，一紀時事（拂郎獻馬），一抒感觸。見《益齋亂藁》卷 4，〈趙三藏李稼亭神馬歌次韻〉，頁 2 下-3 上；《稼亭集》卷 16，〈次韻順菴六句吟〉，頁 11 上。

「為文章，操筆立成，辭嚴義奧，典雅高古，不敢以外國人視也。」著有詩文集《稼亭集》二十卷。¹²²

後至元二年，義璇奉使還國，李穀有詩送之：「數載燕都幸作隣，勝游不問暮兼晨。金臺南郭看山客，畫舫西湖載酒人。」¹²³ 二人在大都居所相近，時同出遊，極是相熟。以數載為鄰來看，二人可能在李穀奉勸勵學校詔書還國（1334）前即已訂交。今《稼亭集》中確知穀為義璇所撰文章即有六篇：〈趙貞肅公祠堂記〉、〈平壤君趙公墓誌〉、〈順庵真贊〉、〈虛淨堂記〉、〈京師報恩光教寺記〉與〈高麗國天臺佛恩寺重興記〉，¹²⁴ 而贈酬詩作更達十首之多，¹²⁵ 足證交情之匪淺。

李穀所撰文中，〈趙貞肅公祠堂記〉與〈平壤君趙公墓誌〉係受義璇之託，為其父仁規與弟瑋而作，¹²⁶ 〈京師報恩光教寺記〉和〈高麗國天臺佛恩寺重興記〉為義璇請為己住持及重興的二座佛寺撰記，而〈順庵真贊〉、〈虛淨堂記〉二篇則係李氏闡述義璇真容與居室命名要旨之作。這些詩文保存了義璇的生平行事，成為今日鉤稽考述的重要來源。其中，〈虛淨堂記〉以代義璇答客問的方式，解釋命堂名為虛淨的緣由，客問內容頗見尖銳：

客有問之者曰：「公雖毀形，而有衣冠紈綺之習。公雖避名，而有國朝褒崇之號。出有九重異眷卿相貴交，入有儒釋賓友之歡。齋厨豐潔，軒戶清幽，或禪誦之餘，焚香煮茗，左右圖書，商證古今。其遇興也，作字如斗，題詩滿紙。至於禮貌談笑，務適人情，和氣所薰，皆充然如有所得。客之好飲者輒醉以酒，如廬山故事，雖世之享富貴而稱好事者，

¹²² 《高麗史》卷 109，〈李穀傳〉，頁 304 上-306 下；《稼亭集·稼亭先生年譜》，總頁 99-100。

¹²³ 《稼亭集》卷 18，〈送順菴奉使東歸〉，頁 5 下。

¹²⁴ 同上注，卷 3，頁 7 下-11 下；卷 12，頁 1 上-3 上；卷 7，頁 12 下-13 上；卷 4，頁 8 上-10 上；卷 2，頁 5 上-6 上；卷 3，頁 1 上-2 下。

¹²⁵ 同上注，卷 16，頁 6 上、8 上、8 上-下、9 上、11 上；卷 17，頁 8 上-下；卷 18，頁 5 下、9 上；卷 19，頁 1 上-下、7 下。詩題恕不具列。

¹²⁶ 〈趙貞肅公祠堂記〉係由王守誠篆額，署銜僅見「省事」二字。見〔韓〕許興植編，《韓國金石全文》，〔高麗〕李穀，〈趙仁規祠堂記〉，頁 1100。此人疑即泰定元年（1324）科進士王守誠（1296-1349），「省事」應係「參議中書省事」之略語或脫文。王守誠之篆額，是否係受義璇之託，記文無載。二人交游有俟進一步的考究。

未有以加焉。烏在其為虛淨也？」¹²⁷

反映時人對義璇富而好事的質疑與批評。李穀的回答，圍繞在義璇為「不離世而能出世，不役心而能存心者，能不為物所化而已。是則珍奇不能奢，患難不能惑，聲色不能淫，何適而非虛淨耶？」¹²⁸ 似有避重就輕之嫌。不過，李穀留下這段珍貴的記述，讓我們有機會注意義璇評價的不同面向。

李穀之外，與義璇有文字往還的高麗文人尚可徵知者有三人：李齊賢（1287-1367）、閔思平（1295-1359）與李仁復（1308-1374）。

李齊賢，字仲思，號益齋。忠烈王二十七年（1301）魁成均試並中丙科，後以本國門下侍中（從一品）致仕，封雞林府君。齊賢曾從忠宣王入元，多有游歷，與元朝文士交往密切，為麗季著名詩人及性理學者。¹²⁹ 他幼年即從其父從游於無畏之門，後與義璇結交。在奉忠肅王命撰寫〈妙蓮寺重興碑〉時，對於義璇「一言感主」，說服忠肅王捐財予忠烈、忠宣真容所在的妙蓮寺，稱譽有加。¹³⁰ 在受義璇之請而作的〈妙蓮寺石池竈記〉中，認為義璇乃「伐冰華胄也。雖圓其顛，而素富貴者也。今為天子之使，一國之主敬愛之如師友，顧乃與騷人墨客逍遙乎風月之場，其襟度可見矣。」¹³¹ 此外，李齊賢尚有一詩，題〈趙三藏李稼亭神馬歌次韻〉，與義璇、李穀相唱和。¹³²

閔思平，字坦夫，號及菴。登忠肅朝第，曾從忠定王於元（1349），本國官至商議會議都監事。¹³³ 義璇卒後，思平先後有詩〈至正乙未……念順菴夙昔之恩，因贈之以《立誓往西方之文》一軸，庶結來因〉與〈哭順菴三藏〉以為悼念，¹³⁴ 內有「悵悵更難聞警策，空留隻履在棺中」之句。

李仁復，字克禮，號樵隱。年十九登本國第，後中元至正二年（1342）科

¹²⁷ 《稼亭集》卷4，頁8上-10上。

¹²⁸ 同上注。

¹²⁹ 《高麗史》卷110，〈李齊賢傳〉，頁320上-328下；《高麗墓誌銘集成》，頁587-592，〔高麗〕李穡，〈李齊賢墓誌銘〉。

¹³⁰ 《益齋亂藁》卷6，頁26上-28上。

¹³¹ 同上注，頁25下。

¹³² 同上注，卷4，頁2下-3上。

¹³³ 《高麗史》卷108，〈閔宗儒傳附閔思平傳〉，頁291上；《高麗墓誌銘集成》，頁560-562，〔高麗〕李達衷，〈閔思平墓誌銘〉。

¹³⁴ 《及菴詩集》卷2，頁13上；卷4，頁8上-下。

進士，授大寧路錦州判官（正八品），東還本國任職。屢使元，元授征東行省都事（從七品）、員外郎。¹³⁵ 仁復曾於義璇新置藏經之際，作詩以讚。其詩今已不存，僅見李穀步韻之作。¹³⁶

李穀嘗譽義璇「知名儒釋間」，又言其「人有儒釋賓友之歡」，現存文獻尚可考知與文士交游情形，概如上述，卻無從追索曾相往還的僧人。義璇捐資重刊《禮念彌陀道場懺法》，日本沙門至道曾為之撰序，序文既未能見出二人關係，文中提及義璇「委其同志比丘祖柏，旁募眾緣，鳩工入梓，以傳諸遠」，¹³⁷ 所謂「比丘祖柏」，其人亦復不詳。義璇佛門同道難覓其蹤，法嗣今且僅知熙菴一人，茲予考述如下。

熙菴生平行事，文獻記載之殊少，猶勝其師義璇。《韓國天臺宗聖典》甚至隻字未及此號人物的存在。桂栖鵬僅能據《牧隱詩稿》的〈大司徒熙菴公繼三藏住黑塔高麗僧院天子北狩脫走東歸……〉一詩敷衍概述之：

熙庵，法名不詳，熙庵當是其號，義璇弟子。從義璇入元，後繼義璇住持大都黑塔高麗僧院，元廷賜封為司徒。明兵入大都，脫走東歸本國，高麗恭愍王命判天臺宗事。¹³⁸

所述略見訛誤，容錄詩題原文，以便說明：

大司徒熙菴公繼三藏住黑塔、高麗僧院。天子北狩，中原兵入城，脫走東歸。玄陵請齋內庭，追念其師順菴公，從容者久之。今上命判天臺宗事。既而為人所陷，入山中數年矣。蒙恩還京，來訪病夫，喜相逢，吟短律。¹³⁹

文中的確說明熙菴繼義璇住持寺院之事，但繼住寺名黑塔為大天源延聖寺俗

¹³⁵ 《高麗史》卷 112，〈李仁復傳〉，頁 352 下-353 下；《高麗墓誌銘集成》，頁 583-587，〔高麗〕李穡，〈李仁復墓誌銘〉。

¹³⁶ 《稼亭集》卷 14，〈順菴新置大藏，李克禮州判作詩以讚，次其韻〉，頁 7 下-8 上。

¹³⁷ 《禮念彌陀道場懺法》卷 1，頁 75 下。

¹³⁸ 桂栖鵬，〈入元高麗僧人考略〉，頁 60。

¹³⁹ 《牧隱藁·詩藁》卷 26，頁 12 上。

名，不應與高麗僧院連讀。義璇駐錫延聖寺期間，尚兼高麗瑩原寺住持，此處高麗僧院應指瑩原寺。再者，所謂「今上命判天臺宗事」，今上並非恭愍王（玄陵，1352-1374），應指辛禡（1375-1388）而言。

前引李穡詩篇外，熙菴相關史料尚有一些。

首先，在李穡《牧隱詩藁》另有一詩，題〈大司徒趙公見和，復用前韻〉，內有「幾年北望憶熙菴，彷彿燕山青似藍，亂後相逢真是夢，謫中之苦不須談」云云，可知詩題的大司徒趙公即指熙菴，趙為其俗姓。¹⁴⁰熙菴系出高麗天臺，兼與義璇同姓，又得繼任住持，二人關係應極深厚。

其次，《安陽縣金石錄》卷十二收有〈勸請萬空廣公長老疏〉，係至正十六年（1356）立石。¹⁴¹疏文記大都諸山勸請萬空長老住持彰德路（今河南安陽）天寧禪寺事，文末揭舉大都諸山寺名，有「延聖寺住持寶林」云云。按所列諸寺多皇家佛寺，如福元、普慶、萬安等，延聖寺應即大天源延聖寺。前文曾經提及義璇之卒，最晚不逾於至正十五年，而繼義璇住延聖寺者即熙菴。熙菴應是法號，法名不詳，以時間和身份而論，寶林可能就是熙菴之名。

復次，《牧隱詩藁》卷二十另錄一詩，值得注意，詩題云：

柳巷門生開酒席，賀公重拜簽書也。僕與廉東亭承招赴席。天臺判事懶殘子亦被請而至，坐談妙蓮三藏時事亶亶不已。醉中聞之，樂其有舊俗遺風，既醒，錄之。¹⁴²

柳巷為韓脩（1333-1384）之號，重拜簽書，〈韓脩墓誌銘〉繫其事於己未年（洪武 12 年，1379）。¹⁴³自時間、談論內容與法銜而言，此處天臺判事，極有可能就是熙菴，懶殘子或係別號。熙菴判天臺宗事，住錫於地藏寺，返麗之後，與李穡、韓脩與李崇仁（1347-1392）等人時相唱和，惜詩作已佚。¹⁴⁴

¹⁴⁰ 《牧隱藁·詩藁》卷 26，頁 15 下。

¹⁴¹ [清]武億輯，《安陽縣金石錄》卷 12，頁 14 上-15 上。

¹⁴² 《牧隱藁·詩藁》卷 20，頁 34 上。

¹⁴³ 《高麗墓誌銘集成》，頁 613，[高麗]李穡，〈韓脩墓誌銘〉。

¹⁴⁴ [高麗]李崇仁，《陶隱集》卷 2，〈熙菴公之判天臺宗事也，住錫地藏寺……公使李生袖詩徵余作，蓋牧隱先生、柳巷先生及公唱和之卷也……〉，頁 39 下-40 上。

六、結語

義璇出身高麗勢族，承傳圓慧、無畏天臺法脈，奉命駐錫大都皇家佛寺，受旨出使行香高麗，「顯然已成為大都佛教界領袖人物之一」。¹⁴⁵無論在中國或高麗佛教史，尤其是中韓佛教交流史上，都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義璇事跡，元麗史料鮮見，《高麗史》不過在趙仁規附趙延壽傳中一見其名，簡述其奪佔寺院之惡，寥寥數語。職是之故，義璇尚為治元史及高麗史者所忽視。史料記載的零散，過去學界對義璇生平的鈎考未盡完善。本文多方蒐羅高麗的正史、文集、石刻與大藏經等相關史料，分就義璇的家世、師承、入元、交游、法嗣等方面，考證論析，具如前述，茲予概括，以為此篇文稿作結。

義璇生父趙仁規雖起微賤，但以精通蒙語與辭令，屢使元廷，得為高麗忠烈王一代名臣，聲勢煊赫。而仁規對佛學的偏好與對文藝的留心，多少影響了義璇。義璇的出家，仁規篤好佛教固為因素之一，高麗靖、文二宗以來的制令與出家後禱佛治病的經歷，也是不可忽視的面向。義璇投身高麗天臺宗，其後又有侄子普解，即連弟子熙菴亦俗姓趙。此時天臺宗法脈傳承及其與平壤趙氏關係之密洽，值得注意。

義璇之前的高麗天臺宗，圓慧與無畏均貴為高麗王國統，然二人都在高麗活動，和元朝佛教尚無關連。承傳圓慧、無畏法脈的義璇，入元之前，在高麗雖已歷住珍丘、萬義、瑩原諸寺，但行事已難詳知，多少反映天臺宗勢力的漸趨沒落。長年寓居大都的忠宣王璋，既受元帝優遇，兼以篤好佛法，入元麗僧明顯增加。義璇的西遊，或許是試圖在這樣的潮流中，尋求重振天臺的契機。當時元廷雖多以教門法師住持皇家寺院，但一來所建皇家寺院多屬藏傳佛教風格，並以帝師駐錫的大護國仁王寺為首，二來更以藏傳佛教加於漢地僧眾之上，崇教抑禪之外，復寓藏密於其上。義璇以一高麗天臺宗僧人，得獲元帝寵眷入主大天源延聖寺，與元代的宗教政策不無關係。

入元為皇家佛寺住持是義璇一生最重要的事跡，也是其備受尊崇的原因所在。後至元二年，義璇返國行香所署法銜為「特賜定慧圓通知見無礙三藏法師，大天源延聖寺、大報恩光教寺兼高麗瑩原寺住持，福國祐世靜明普照玄悟大禪師，三重大匡慈恩君」。此銜頗堪玩味。「特賜定慧圓通知見無礙三藏法師」係元朝方面所賜法階，以之冠首，表示尊榮。其次歷舉義璇所住三寺，仍以元大都皇家寺院的延聖寺居先。此後方是高麗所賜法階與官階。次序排列，

¹⁴⁵ 陳高華，〈《稼亭集》、《牧隱稿》與元史研究〉，頁 329。

以元為尊，元麗佛教交流仍不免有事大心理的反映。此其一。義璇既遠在大都，尚兼主瑩原寺以繫高麗天臺宗法脈。義璇弟子熙菴亦復如是。就現存文獻言，此時天臺宗除義璇、熙菴外，幾無其他法師行跡可述。高麗天臺宗幾賴住持大都的義璇師徒維持。不過，受限資料，義璇兼住高麗瑩原寺的方式，以及如何處理寺務，我們尚不清楚。此其二。義璇所署「大禪師」之銜，為高麗僧科禪宗系統的最高位階，而包括禪師、大禪師在內的高級僧侶們，則是高麗王師、國師的主要來源，可見其高麗佛教界的重要性。此其三。

義璇能詩並善大字，詩文的造詣成為與士人交游的重要根本。現知與義璇有文字往還的文人李穀、李齊賢、閔思平與李仁復等，均係高麗人士。這四人均為高麗科第出身，李穀與李仁復且為元朝進士，可以概見義璇擇友的傾向。義璇法嗣熙菴，繼主延聖與瑩原二寺，元廷賜封司徒，明軍入大都，熙菴即脫走東還本國。返麗後，先受恭愍王請以追念其師，再被高麗辛禔命為天臺宗判事。從中略見麗末天臺宗的發展。

附錄：義璇生平簡表

- 1278 年／元世祖至元 15 年／高麗忠烈王 4 年
兄趙延壽生，義璇當晚於此年出生。
- 1287 年／元世祖至元 24 年／高麗忠烈王 13 年
弟趙瑋生，義璇當早於此年出生。
- 1298 年／元成宗大德 2 年／高麗忠烈王 24 年
此年之前，應已於妙蓮寺出家，或為圓慧弟子。
- 1308 年／元武宗至大元年／高麗忠烈王 34 年
投天臺，中禪選上上科，為禪師，住持高麗珍丘寺。
- 1314 年／元仁宗延祐元年／高麗忠肅王元年
在佛恩寺。罹患重病，禱於寺中藥師佛像而癒。
- 1323 年／元英宗至治 3 年／高麗忠肅王 10 年
入大都。前此，歷住高麗的萬義寺與瑩原寺。
- 1332 年／元文宗至順 3 年／高麗忠肅王復位元年
捐資重刊《禮念彌陀道場懺法》。
- 1333 年／元順帝至順 4 年／高麗忠肅王復位 2 年
奉高麗忠肅王與瀋王召，住持大都大報恩光教寺。
- 1336 年／元順帝至元 2 年／高麗忠肅王復位 5 年
奉旨回高麗降香祝釐，重修佛恩與妙蓮二寺。
時已為大都大天源延聖寺與大報恩光教寺住持，兼住高麗瑩原寺。
- 1338 年／元順帝至元 4 年／高麗忠肅王復位 7 年
返大都。
- 1355 年／元順帝至正 15 年／高麗恭愍王 4 年
閔思平作詩輓之，是其卒當在此前。

【參考書目】

一、佛教藏經與古籍

- 《元史》，〔明〕宋濂等，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6。
- 《及菴詩集》，〔高麗〕閔思平，《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3輯，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初版，1996再版。
- 《全室外集》，〔明〕釋宗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4冊，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危太樸文續集》，〔元〕危素，《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本，據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影印，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安陽縣金石錄》，〔清〕武億輯，《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8冊，據清嘉慶24年（1819）《安陽縣志》附刊本影印，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 《羽庭集》，〔元〕劉仁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6冊。
- 《東文選》，〔朝鮮〕徐居正編；〔日〕末松保和編，《學東叢書》本，據蓬左文庫藏活字本影印，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70。
- 《牧庵集》，〔元〕姚燧，《四部叢刊·初編》本，據武英殿聚珍本影印，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 《牧隱藁》，〔高麗〕李穡，《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4輯。
- 《柳巷詩集》，〔高麗〕韓脩，《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5輯。
- 《皇元風雅後集》，〔元〕傅習、孫存吾，《四部叢刊·初編》本，據高麗仿元刊本影印。
- 《胡祇遹集》，〔元〕胡祇遹撰；魏崇武、周思成校點，收入李軍主編，《元朝別集珍本叢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 《益齋亂藁》，〔高麗〕李齊賢，《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2輯。
- 《高麗史》，〔朝鮮〕鄭麟趾等，景印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
- 《高麗寺院史料集成》，〔日〕齋藤忠，東京：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1997。
- 《高麗墓誌銘集成》，〔韓〕金龍善，江原道春川市：翰林大學校出版部，1993初版，2006第4版。
- 《梧溪集》，〔元〕王逢，《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5冊，據元至正明洪武間刻明景泰7年（1456）陳敏政重修本影印，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陶隱集》，〔高麗〕李崇仁，《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6輯。
- 《揭傒斯全集》，〔元〕揭傒斯撰；李夢生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陽村集》，〔高麗〕權近，《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7輯。
《解醒語》，〔元〕李材，《筆記小說大觀》本，臺北：新興書局，1975。
《稼亭集》，〔高麗〕李穀，《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3輯。
《韓國金石全文》，〔韓〕許興植，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4。
《禮念彌陀道場懺法》，〔金〕王子成，收入藏經書院編，《卍續藏本》第128冊，
《中國撰述·禮懺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臺1版。

二、專書、論文、網路資源等

- 何勁松 1993 〈天臺宗在日本和韓國的傳承與發展〉，《韓國學論文集》第2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74-87。
- 何勁松 1999 《韓國佛教史》（下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姜東成 2006 〈元大都敕建佛寺分佈特點及建築模式初探〉，「元代佛教與少林寺國際學術研討會」（10.11-13），登封縣：少林寺、中國元史研究會、暨南大學文學院。
- 洪金富 2008 〈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頁1-40。
- 桂栖鵬 2001 〈入元高麗僧人考略〉，《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38.2，頁58-62。
- 張言夢 1999 〈元代來華高麗僧人考述〉，《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116，頁36-42。
- 許正弘 2009a 《元代原廟制度初探——以太禧宗禪院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正弘 2009b 〈元大都大天源延聖寺考論〉，宣讀於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等主辦之「紀念元大都」國際學術研討會（7.29-30）。
- 許正弘 2010 〈試論元代原廟的宗教體系與管理機關〉，《蒙藏季刊》19.3，頁54-79。
- 陳高華 1992 〈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世界宗教研究》2，頁2-6。
- 陳高華 2006 〈《稼亭集》、《牧隱稿》與元史研究〉，收入郝時遠、羅賢佑主編，《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321-335。
- 陳得芝 1989 〈元代內地藏僧事輯〉，原載《中華國學》1，後收入氏著，《蒙元史研究叢稿》，頁233-251。
- 陳得芝 1992 〈論元代的「詩禪三隱」〉，原載《禪學研究》1，後收入氏著，《蒙元史研究叢稿》，頁502-523。

- 陳得芝 2005 《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 黃春和 2001 〈元代大聖壽萬安寺知揀事迹考〉，《北京文博》4，頁 33-40。
- 楊曾文 2006 《宋元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潘桂明、吳忠偉 2001 《中國天臺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蕭啟慶 1983 〈元麗關係中的王室婚姻與強權政治〉，原載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編，《中韓關係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960-1949》，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後收入氏著，《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頁 231-262。
- 蕭啟慶 1997 〈元朝多族士人的雅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 6，頁 179-203。
- 韓國天臺宗總務院 2007 《韓國天臺宗聖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日〕小川裕充 2000 〈北宋時代の神御殿と宋太祖、仁宗坐像について——その東アジア世界的普遍性〉，《國華》1255，頁 17-29。
- 〔日〕中村淳 1993 〈元代法旨に見える歴代帝師の居所——大都の花園大寺と大護國仁王寺〉，《待兼山論叢（史學篇）》27，頁 57-82。
- 〔日〕中村淳 1999 〈元代大都の敕建寺院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58.1，頁 63-83。
- 〔日〕北村高 1985 〈高麗王王璋の崇佛〉，《東洋史苑》24/25，《小笠原宣秀博士追悼論文集》，頁 117-141。
- 〔日〕忽滑谷快天 1995 《韓國禪教史》，朱謙之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日〕竺沙雅章 2000 〈燕京・大都の華嚴宗——寶集寺と崇國寺の僧たち〉，原載《大谷大學史學論究》6，後收入氏著，《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頁 215-252。
- 〔韓〕李成茂 1993 《高麗朝鮮兩朝的科舉制度》，張璉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韓〕金煥泰 1993 《韓國佛教史概說》，柳雪峰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韓〕閔賢九 1976 〈趙仁規와 그의家門（上）〉，《震檀學報》42，頁 17-28。
- 〔韓〕閔賢九 1977 〈趙仁規와 그의家門（中）〉，《震檀學報》43，頁 5-32。
- 〔韓〕趙善美 1996 〈韓國肖像畫の類型與特徵〉，《世界美術》2，頁 39-43。
- Hsiao, Ch'i-ch'ing. (蕭啟慶) 1978.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 Study on the Life of Yi-Xuan, a Korean Buddhist Monk in the Yuan Dynasty

Hsu, Cheng-Hung

Doctoral Student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uddhism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during the Mongol-Yuan period had reached a peak in Chinese history. Many Korean Buddhist monks came to China at that time. Yi-Xuan (義璇) was one of them. An important pers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Yuan-Korean Buddhism, he was nominated by the Mongol Emperor as the abbot of the Great Tian-Yuan-Yan-Sheng Temple (大天源延聖寺), one of the imperial temples in the capital area. He had once returned by imperial order to Korea for praying for the Emperor and the state. This paper aims at giving an overall look upon Yi-Xuan's life, including his family lineage, his religious belief, his important deeds, and his friends and disciples. It will als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assignment to imperial temple's abbot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antai Sect (天台宗) in Korea.

Keywords:

Yuan dynasty, Yi-Xuan, Great Tian-Yuan-Yan-Sheng Temple, Korean Buddhist monk, Tiantai Sect